

游幕、“師爺”與文學——讀《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研究》

海龍 紐約商務雜誌

文化人類學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有機體構成;這個有機體是人類所從事之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的文明載體。而在這種文明框架下的人類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或官場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人類歷史嬗替和演變的舞臺和背景。

中華文明之制度化演進以其高度的系統延續性和成熟性為世界文化史研究者所矚目;而其中特別是古代中國官員選擇和使用制度曾為西方人盛贊,並成為他們傳統政治學界所崇仰及借鑒的主臬。在歐洲 18 世紀啟蒙主義時代,西方著名哲學家孟德斯鳩等在《論法的精神》里曾帶著欽羨的口吻讚美中國的科舉和選官制度;另一位百科全書派先驅伏爾泰對此也有很多讚美之詞。據史料所載,在美國立國之初,著名政治家、發明家富蘭克林曾經精研中國社會組織和制度史、甚至打算派大員代表

力的支撐點和後續補充系統即中國官僚的潛體系“幕府系統”(亦稱“游幕”“幕賓”“幕客”“幕友”“師爺”)取仕制度——這里大約因其最後一個通俗稱呼“師爺”最為一般民眾和讀者所熟知。

關於科舉制,我們已經有了汗牛充棟的著作,這是讀者大多都熟知的话题。本文重點討論文人游幕入仕的這一途徑。

首先我們談談什么是“幕”或“幕府”以及它跟中國制度史的關係。幕,顧名思義是營帳幕具之類,它的主要功能是具可移動性特點。帳幕可以滿足基本生存的遮風擋雨、臨時辦公和處理緊急事務之需要。在中國古代將帥出征戎馬倥傯、治無常處,需要安營紮寨,則需幕人張幕設案,這類臨時、流動性的辦公處以幕為府,故稱幕府。幕府除了主官以外還有佐治人

革,他基本上阻斷了讀書人通過游幕晉身正式成為國家公務員的道路,而將古已有之的游幕入仕的“官路”改成了“私路”由幕主人私人聘任。這種制度也改變了中國文人入仕之途的走向。朱元璋的改制規定,正常情況下,國家不再承認或委任幕府主官所聘任的游幕文人。他擴大了吏部的權限而將這些吏、僚的委派權收歸于中央政府。

但吏部官派的這類官員大多是庸才或擺設無法履行職責,要想做好工作,幕府主官仍然需要自己另行募聘幕賓。因之在明代文人游幕制度出現了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只是影響了這種行政文化的執行,它甚至影響了此後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它牽涉到時勢、軍事、當時的行政文化和文、史、哲等多方面的互動和影響,似乎是一個難解之謎。所幸,最近筆者

則更是風起雲湧,直接催生了有清一代“師爺”制度。毋庸諱言,這一群體在最偉大的我國近現代文明變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

舉其要者,我們在下面疏略的名單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文化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大多從事過游幕或做過幕賓:沈周、唐寅、徐渭、李贄、王稚登、袁中道、李漁、侯方域、王世禎、袁枚、趙翼、鄧石如、包世臣乃至清代名流林則徐、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和寫《浮生六記》的沈復等各色人等都曾有過游幕甚至終生在幕的經歷。

這些人中囊括了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美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書法家畫家詩人和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諸種人等,他們差不多是明清文化史中耀眼的翹楚。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游幕和他們,近代中國文明史冊將失去多少奪目的光芒!

我們前面說過,明朝對游幕的限制和制度化的阻斷在其前期對文人從幕是一個打擊,它逼使這種古已有之的制度必須在新形勢下轉型。是故,呂靖波書中認真分析總結了這種背景並重新劃分了明代文人游幕的四個時期暨一. 洪武初至弘治末明朝初的低谷期、二. 其後至正德、嘉靖朝逐漸發展的復興期、三. 經歷過筆路藍縷復甦明末的發展期以及四. 出現于南明時期的高潮期。

明代一改舊制將游幕的半官方性質改為主官私聘制對游幕文人當然是個打擊;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它也給了游幕文人更多的自由。呂靖波指出,明代的這種制度卻促使了幕主和幕賓之間更加靈活和自主的身份關係。因為幕賓純由主官私人禮聘,這里強化了其“友”或“客”的身份。而這種新型的幕府制度的特殊性決定了明人游幕與仕途之間並無直接關係。因此,明代游幕對幕賓階層及出身沒有嚴格要求,可以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比如武人、藝人、醫士、巫覡甚至謫戍者亦可入幕。

此外,因為游幕從半官方變成了私人禮聘性質,幕主跟所聘用文人關係亦更為親近,對幕客的禮數也更為周到。而游幕性質一改為私聘制,文人和幕主的關係更加鬆散、互動更加親密,甚至大多情況下可以“來去自由”。這種寬鬆的關係更加利于刺激文人發揮所長或有更多自由來一展其才。

當然,這種改變也有很多不利因素。比如說,此期游幕文人沒有官銜不在體制內,自然就減少了榮譽心和責任心。此外,游幕由過去的半入仕變成了私人顧問性質,除了一些胸懷志向的學人外,這種制度更增添了一層為經濟謀利益性質和鼓勵文人“售其才”或“稻粱謀”的“搵食”性質,為其後的游幕轉變為職業性“師爺”開啓了先河。

三 那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傳統中文人游幕的簡史和幕賓們的基本職責和功能,使一般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幕府和文人游幕制度是如何輔助中國科舉考官制度,並呼應前文回答它是如何幫助中國古代制度文化(institu



(中国官场文化曾经是西方人感到最神秘的一种制度)

“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到中國去取經學習中國的制度史。

而美國另一位著名政治家、《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遜對中國的熱愛竟更迷狂;除了讚美中國的文化制度,他甚至宣稱中國人的素養是“天生的貴族”云云。

為什麼那時候的西方人那么神化中國呢?他們大約是對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和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人才選拔體制比較服膺。

在古代西方,其政治操作及選官制度比較簡單霸道。它們的國家權力被教權和皇權雙重操控。其官員遴選不取決于才能和知識而是由上述權力操弄。其用人標準多在門閥戚貴族中輪轉,其範圍也基本出自世襲、封賜和委任貴族豪門、騎士親信、政治夥伴、同宗僧侶階層;其性質大多是利益分肥、強調個人忠誠而不看才能和知識。因此他們各級官員之錄用皆出于政治委任和利益衡量,其陞遷罷免不靠才能知識或政績,而大多僅由當權者個人意志所決定。這種用人唯親的決策肯定有着很多的隨意性甚或論功行賞的性質。

此種流風甚至在當代美國政治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比如說當選總統往往以獎賞性質委派曾幫助其競選出力者為駐外大使、總統指派並使用其親信甚或家人承擔政府重要政務官、顧問等職,等等。

顯而易見,西方這種舊的選官制堵塞了讀書人和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並走向國家領導體制的道路。在文藝復興以前,讀書人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去參與國家行政事務。門閥和出身堵塞賢路,直到啟蒙運動以後甚至工業革命以後西方纔開始有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的機制。

而中國,早在古代就有了一系列選官和相應的迴避措施來對官、吏進行制度化的甄選並建立了嚴格的評價體系和陞遷制度;從而在行政層面上保證了這種系統化選官和用官制度的莊嚴性和有效性,建立了比較合理的國家機器運轉機制。這大約是文藝復興以後西方思想家讚美中華體制中官員選拔 - 陞遷及使用制度的一個依據。

在西方甚至在中國,一般人皆往往以為古代中國選官的主要形式是科舉,是依此“讀書做官”。這句話不錯,但它只說對了一半。

其實,僅僅靠科舉取仕並不能支撐整個中國選官制度體系的大廈。它還有另一個更強有

員如參謀、文書等統稱幕僚。這幕也被稱為“帷幄”;《史記》中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亦即指此。

初始時因為軍隊將領出征居無定所而用幕,但後來“幕”有了新的定義。它的內涵延伸了,成了一個語義符號並有了衍生物。譬如說,以後跟軍事無關的政務或行政機構也借用了“幕”這個術語來表示其附屬如管事、參謀、文職人員和其他職員。

據考,衍生到後來,除了有真正意義上的將帥幕府“總兵幕”以外,其他諸如“三司幕”“督撫幕”,甚至跟軍事沒有關係的地方性行政機構也沿用了這個機制和術語如“州(府)縣幕”,“大學士幕”“藩王幕”乃至為宦官服務的“宦官幕”等。

這些形形色色的“幕”的主要構成是讀書人,他們的基本職責是為主人或主官做參謀、書記、文職或做某個方面的專家顧問之類來佐理公務。

在上述各種幕之設置中,文人擔任的幕賓職務有長史、參軍、主簿、記室、參謀、顧問等名目。他們的職能多在參贊而非決策;這類人員大多任重耐煩,慮事周全,他們需具備政務或處理事務的常識,成為通才或某方面的專才。

考“幕”之原始名目之設應在軍事方面。是故被幕主人所聘之游幕文人亦被稱作“幕僚”,他們的職責多在軍事參謀部門。這種原始功能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說,日本軍人今天仍然沿用“幕僚”一詞的原始義。在日本自衛隊軍事用語中仍然使用“陸上幕僚監部”“海上幕僚監部”等。而美國白宮、國會官職或參謀顧問處仍然用“白宮幕僚長”“議員幕僚”“軍事幕僚”等詞作為官方稱謂。

游幕、幕僚、幕賓等作為軍事或行政主官的附庸多為政府認可,它曾經是一種傳統官制的補充形式。在古代,主官可以任命或聘請幕僚或幕賓成為自己的副官和參謀、文職人員;可以經過報備成為正式官吏,也可以以私人聘用的形式來充實自己的官吏和僚臣系統。這成了中國古代文人除了參加科舉考試外的另一個晉身展示才能的台階,同時也是他們建功立業實現抱負的另一條渠道。千百年來,這一傳統客觀上培養並造就了無數的優秀文人和知識分子。

但是,歷史發展到了明代,這種制度有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變革。明太祖朱元璋宣佈徹底改

得讀呂靖波的專著《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研究》一書,使我對長期思考猶疑的問題得以洞悉明察,大有豁然開朗之快。故思循其思路略加探討,跟讀者共享閱讀此著的體會和心得。

二 中國統治者蓄幕之風可以說源遠流長。如果我們從源頭審視,大約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養士制度。這種流風後來發展成統治者籠絡或者競聘文人任其謀臣或技術官僚並填充智囊、或為之承辦日常公務。

這種制度亦有着不同的異變形式且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比如說,在某種意義上,秦朝的李斯就可被看做是雛形期幕客的一種,有的論者甚至認為他可被看做是文人游幕的祖師。而到後來,招羅文人入幕途路更廣,甚至大開招募隱士、名士入幕之風。在這種意義上,李白、杜甫和韓愈等也都應算曾有人幕經驗者。其後宋元時代,游幕之風日熾。物極必反,遂導致了明代的急剎車。

其實,明代的改制並沒能真正取消幕府制和文人游幕的風氣。只是迫于當時的時世,游幕轉而以另一種形式呈現——在真實意義上看,明清時代雖然因吏制改革幕僚不再為官方聘任或承認,但是它卻以不同的面目有了更加茁壯的發展。舉例而言,僅從數量上和質量上,它的人職者更眾;而從文化意義上,它

